

远游在东方的缪斯

——外籍来华诗人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龚敏律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得了湖南师范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湖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远游在东方的缪斯

——外籍来华诗人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龚敏律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游在东方的缪斯——外籍来华诗人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 龚敏律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5648 - 3088 - 5

I. ①远… II. ①龚… III. ①诗人 - 人物研究 - 国外 ②中国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K815. 6②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846 号

远游在东方的缪斯——外籍来华诗人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Yuanyou zai Dongfang de Miusi——Waiji Laihua Shiren yu Zhongguo Wenxue de Hudong Yingxiang Yanjiu

龚敏律 著

◇组稿编辑: 李 阳

◇责任编辑: 李红霞

◇责任校对: 李 航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印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4. 75

◇字数: 255 千字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3088 - 5

◇定价: 49. 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731 - 88872256 88873071

投稿热线: 0731 - 88872256 13975805626 QQ: 1349748847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瑞恰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7)
一、瑞恰慈在北平高校文化圈的文学活动	(9)
二、瑞恰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影响	(17)
三、瑞恰慈与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的家园	(29)
第二章 艾克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40)
一、艾克敦：北平 30 年代文化圈的“洋文人”	(42)
二、艾克敦：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中的瓦雷里诗歌解读	(54)
三、艾克敦的诗作对“北方系”新生代诗人的影响	(60)
第三章 朱利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81)
一、朱利安在国立武汉大学的教学活动	(82)
二、朱利安与国立武汉大学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	(93)
三、朱利安与中国：左翼文学潮流中的理性思考和浪漫想象 ...	(104)
第四章 燕卜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116)
一、燕卜苏在中国的文学活动	(116)
二、燕卜苏的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	(126)
三、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对燕卜苏诗歌创作的影响	(138)

第五章 奥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149)
一、奥登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战地行纪”	(149)
二、奥登与中国现代诗歌的转型与发展	(162)
三、奥登与中国：中国之行的精神烙印和文化想象	(175)
第六章 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外籍教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193)
一、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的文学活动	(194)
二、包贵思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和影响	(201)
三、中国新文学的仰慕者与传播者	(208)
结语	(218)
参考文献	(224)

引言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向西方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这种学习和借鉴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如胡适、洪深等负笈西洋，直接在西方文学中浸润自己的文学修养，有的作家如茅盾、叶圣陶等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却十分重视本土的翻译事业，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另外还有一种途径比较特殊，这就是一些在华的外籍诗人的文学活动的影响。这些外籍诗人或是教师，或是记者，或是传教士，他们凭借种种机缘曾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亲身经历或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建构。由于他们一方面在西方文学界享有一定的声誉，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切身的体验，一方面又暂时处身于一种正在热情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异质文化中，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和穿梭往返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不仅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中，而且在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也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这些外籍来华诗人，包括了曾经来到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的瑞恰慈、燕卜苏、艾克敦，燕京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包贵思、谢迪克等，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的朱利安，以及来到中国进行战地访问的奥登。

毋庸置疑，这些来自西方的外籍诗人在他们的本土都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人士，有的甚至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专家。譬如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他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新批评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美学家、诗人、语言教育家。他的重要学术代表作《美学基础》《文学批评原理》《意义学》《科学与诗》《实用批评》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到 80 年代，瑞恰慈一共五次访问中国，不仅在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外语系担任过为期一年左右的客

座教授，也曾经在抗战前后在中国大力推广基本英语运动。又如燕卜苏（William Empson），他是瑞恰慈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得意弟子，也是 20 世纪英国思想文化界很有名的文学批评家、诗人、学者。燕卜苏的学术论著《朦胧的七种类型》和《田园诗的几种变体》对西方现代诗歌创作和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燕卜苏在 1937 年抗战烽火点燃之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燕卜苏不得不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师生一路辗转迁移，途径长沙、南岳，最终来到云南昆明。在简陋的教学条件之下，燕卜苏仍然坚持自己作为教师的神圣职责，不仅给中国学生讲授西方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也给他们宣扬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些基本创作理论和美学原则。

至于奥登（Wystan Hugh Auden），他是 20 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现代主义诗人。作为英国牛津大学的高材生，他在大学校园时期就已经和其他几位牛津诗人——刘易斯、麦克尼斯、司班德一起活跃于英国诗坛，形成了一股左翼诗歌创作潮流，并成就了英国诗歌史上著名的“奥登一代”。奥登后来移民美国，在美国期间也写下了大量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的诗歌，为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和转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38 年 1 月 19 日，奥登和他的好友衣修伍德（C. Isherwood）以英国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四个多月，于同年六月底才回到英国。奥登在中国虽然只生活了四个多月，但是他的中国之行却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热烈欢迎，而他在中国期间以及回到英国以后，以中国抗战为题材所创作的诗歌在世界诗坛都有重要的影响和很高的声誉。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贝尔（Julian Bell），也是英国 30 年代诗歌史上与奥登、燕卜苏、史本德、莱曼等齐名的诗人，出版过《冬之动》《冬日的作品——以及其他的诗歌》两本诗集。朱利安的家学渊源极其深厚，他是英国现代文化史上鼎鼎有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学派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朱利安于 1935 年 9 月到达中国，并于 1937 年 1 月离开，前后一共十六个月。朱利安任教于武汉大学人文系，他来武汉大学教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帮助中国学生认识 and 了解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世界。大致比朱利安略早一点来到中国的艾克敦（Harold Acton）是 20 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他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一共出版过四本诗集：《水族馆》《一头印第安的驴》《五个圣徒和一个附属品》《混

乱无序》。艾克敦的诗歌创作在英国诗坛也曾大放光彩，他和朱利安、奥登、燕卜苏等年轻的诗人一道，都是英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弄潮儿。在这些人间，艾克敦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可谓最久，也最为集中。他于1932年1月离开欧洲前往中国，直到1939年底离开，艾克敦在中国住了整整八年时间，对中国的文化、文学、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都有深厚的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加剧时，他为了报效祖国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不得已离开了中国。艾克敦在中国期间，不仅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外文系的教授，还经常混迹于30年代的北平文化圈。他不仅在课堂内给中国学生讲授西方诗歌，也在课余和爱好诗歌和文学的学生们切磋诗艺、畅谈文学。

此外，燕京大学外文系的一些外籍教授同时兼有诗人、作家、诗评家的身份，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创作才能在当时的中西思想文化界也是非常突出的。谢迪克（Harold Shadick），出生于英国伦敦，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学哲学，1925年应聘来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便担任西语系主任职务。谢迪克在燕京大学期间讲授过多门英国文学方面的课程。包贵思（Grace M. Boynton）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一位美籍女教授，她是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的高材生，获得了硕士文凭。包贵思于1919年抛下双亲，远赴重洋来到中国。她先是在协和女子大学任教，后来又长期在燕京大学任教。包贵思在燕京大学主要讲授西方文学，她为人慈祥和蔼，教学严肃认真，还常常召集学生们到自己的家中进行读诗会等课外活动。柯安喜（A. Cochran）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女教授。她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大学，在哥伦比亚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柯安喜于1927年在中国燕京女子学院任教，对戏剧这门艺术很感兴趣。她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也和包贵思一样，帮助过很多燕京大学的学生排演戏剧，使得燕京大学的校园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0世纪上半叶外籍来华诗人在华的生活与工作，以教学和文化交流为主。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爱好和专长，出于他们与周边的中国现代诗人和文学青年们的密切关系，他们也经常参与到学校或所在城市的文学活动中。这些文学活动，早已深深地刻印在现代中国诗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这些外籍来华诗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抱有相当真诚的热爱之情，而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创作观。这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故事，所形成的种种因缘，构成了外籍来华诗人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学的互动影响这一独特的文学史现象。对这一文学史现象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界才刚刚起步。近年来，有国外的学者在其著作中谈到了20世纪中西文化和文学的互动交流问题，如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在其著作《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中就谈到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诗人、学者之间的互动影响。在这本著作中，劳伦斯谈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徐志摩的关系问题，也谈到了这一文化圈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朱利安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互动影响关系。当然，这部著作的研究重心并不在此，而且在研究的对象上也并未涉及到瑞恰慈、燕卜苏、奥登等诗人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国内，赵毅衡的随笔集《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但是，因其作品体裁的限制，这部随笔集还只是对这些外籍来华诗人的活动的简单介绍，也没有从学理的层面来探究这些诗人究竟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成熟，更没有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和文学对这些诗人的具体影响。葛桂录在中英文化与文学交流问题上，可以说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著作《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可以说是他长期致力于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葛桂录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来梳理和探究英国文学如何被译介和传播到中国的，当然，他还注重探究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中国文化的认知与建构问题。中英文化和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已经被纳入到他的研究视野之中，成就了他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葛桂录在其著作之中更多的是从文化角度去探究这一论题，而未能从更为细致的文学学理层面去探究来华的英国诗人与中国文学、中国现代诗人之间的互动影响。在其著作之中，他仅提到了燕卜苏和奥登两位英国诗人，而瑞恰慈、朱利安、艾克敦以及燕京大学的作家教授则均未涉及。

在中西诗学交流问题上，新时期以来学界不断有一些重量级的学术著作出现。例如，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江弱水的《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谭桂林的《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李岫和秦林芳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等。这些学术著作关注中西诗学交流问题，但更多的是从传播和译介的角度，侧重在研究西方诗学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而对外籍来华诗人在华的文学活动以及这些来华诗人又是怎样地受到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则很少涉及。在这方面，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些曾

经受教于这些来华诗人的中国现代诗人与学者，他们在新时期以来所写的一些相关的回忆录，如王佐良的《怀燕卜荪先生》等，为这一课题的展开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一些学者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一些外籍来华诗人在华的文学活动的探讨与分析，如葛桂录的《I. A. 瑞恰慈与中西文化交流》、赵文书的《W. H. 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赵文书的《奥登与九叶诗人》、季剑青的《“实际批评”的兴起：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的学院文学批评——以叶公超、瑞恰慈为中心》、陈越的《重审与辨正——瑞恰慈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反应》等，可以说为这一论题的综合研究与整体考察的展开，提供了具有学术分量的个案研究成果，奠定了继续深入研究和宏观考察的学术基础。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外籍来华诗人在华文学活动及其与中国现代诗人的互动影响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深入和拓展之处。第一，学界对于外籍来华诗人在华的文学活动目前只有零星的回忆性文章，没有通过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和外文资料来整体还原他们当时的文学活动，更没有从整体上来评估界定他们作为现代诗学的代表性人物在华文学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纵观学界对这一问题所占据的资料，可以发现其中还有大量外文资料尚未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和重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这些外籍来华诗人中如瑞恰慈、朱利安、奥登、燕卜荪等都有写日记、写随笔、写书信的习惯。国外学界也早已把他们的日记和随笔编辑成册，并公开出版。这些作家在中国期间的主要活动以及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交往情况，在他们的日记和书信之中都有所记载。其次，还有一些外籍来华诗人如艾克敦甚至把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文学活动以自传的形式书写出来，并公开出版。艾克敦的《一个爱美者的回忆》这一自传体的文本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艾克敦在中国的主要活动，也同时能够了解到 30 年代京派文化圈生存和发展的形态。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应该也必须包括外籍文学家在现代中国国土上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由于现代中西文学交流的特殊性，中国本土作家和在华工作的外籍文学家共同创造了现代中国文学历史。怎样将外籍文学家在华活动和创作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场域，并考察它们作为历史主体在历史建构中所产生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将它们作为历史客体来考察其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学术命题。

第二，大多数研究者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国诗人对于中国现代诗人的影

响研究这一维度上，却忽略了中国东方文化、中国现代诗人对于这些来华工作的外籍诗人的影响。异质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应该是互为镜像，互为参照物的。长期以来，中国学界都只是注重中国诗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和影响，以中国诗人的文化主体性为立论的基点，思考中国现代诗人对于瑞恰慈、燕卜苏、奥登等现代派诗人的选择、接受和疏离。实际上，外籍来华诗人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在中国的文学活动和生命体验，也促使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进一步探究和思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学界也同样存在着相关外文资料阙如和不足的现象。这些外籍来华诗人的英文诗歌集或是小说集也早已在国外出版，但国内学者对此并没有关注。例如，瑞恰慈作为一个对中国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的理解和认知相当精深的大学者、大诗人，他不仅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融合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国内学界仅仅看到他的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而未能认识到他的具体诗歌创作其实也曾经借鉴和吸收了中国文化的因子。奥登虽然在中国只生活了四个多月，但是他回到英国以后不仅以在中国的战争体验写作了著名的《战争时期》十四行集，还在他的随笔之中不断地提到过中国的社会现状以及中国文化形态。奥登后来移居美国，其后期的诗歌创作之中，不仅能够看到诸如长城、中国瓷等中国式的意象，还能够感受到中国道家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其创作的具体影响。此外，如朱利安、燕卜苏、包贵思等，也都曾经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为创作的基本思想元素，展开自己对现实、历史、文化、生命的深度思考。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全新体验和深刻认知，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和认知，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创作实践活动和生命观念、哲学观念。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在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复杂丰富的精神面貌，也必定是一种双向的、多维性的交流。这些问题是深入研究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前提和基础，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也应该进行深入的梳理和探究。笔者着手研究这一课题，即有意突破研究界往往只看到西方文化于中国文学的顺向影响却忽略中国文化对于西方诗人的逆向影响的局限，希望能以此为国内学界提供一部关于此课题的扎实而专门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

瑞恰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影响研究

瑞恰慈 (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 1893 年 2 月 26 日出生于英国, 是 20 世纪英国思想文化界著名文学批评家、美学家、诗人、语言教育家。1919 年到 1929 年间瑞恰慈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 给年轻的大学生们教授英国当代小说和文学批评等课程。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之中, 瑞恰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严密逻辑体系和深厚理论水准的文学批评思想, 成为推动 20 世纪文学批评走向科学化、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剑桥大学的十年时间, 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在这一历史阶段写了七部美学与文艺哲学著作, 同时还在文学理论中引入了语义学、心理学作为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他的重要学术代表作《美学基础》《文学批评原理》《意义学》《科学与诗》《实用批评》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产物。他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新批评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理论学说在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瑞恰慈在英国时期就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在剑桥任教期间与他人合作所写的《美学基础》一书, 其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要将儒家的中庸思想作为美的最高原则来看待。瑞恰慈在性格上比较好动, 向往自由, 不太喜欢一成不变又呆板沉滞的生活。他的个人爱好丰富多彩, 他热爱旅行, 喜欢登山和其他户外运动。在这一点上, 他和他的妻子多萝西可谓是志同道合。瑞恰慈在 20 年代的英国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进步, 但他对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已经有些倦怠了, 他好动的心灵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而正是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寻找冒险和新鲜的感受的时刻, 中国的清华大学向他抛来了学术的橄榄枝。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随着西方文化知识在国人心目中的逐渐普及, 中

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开始从民间层面走向政府层面，由自发的行为走向组织化与程序化。1928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教育部组织法》，在教育部下设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掌管下列各事项：（一）关于国际文化团体合作事项；（二）关于国际间交换教授及学生事项；（三）关于国外研究及考察事项；（四）关于国外留学生选派及指导事项；（五）关于国际出版品交换事项；（六）关于其他国际文化教育事项。^①1929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对英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瑞恰慈发出了来校任教的邀请。这一举措其实就是对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所规定的“关于国际间交换教授及学生事项”这一方针政策的响应。1928年8月7日，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在科学馆会议室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第二条决议是有关新聘任的教授名单。在这条决议的名单上，就赫然印上了瑞恰慈的名字。清华大学之所以聘任瑞恰慈作为国际间的交换教授，也是出于对瑞恰慈在当时欧洲学术界的名声和地位的考虑而做出的决策。清华大学在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问题，一直是紧密地与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和文化相接近的。瑞恰慈在20年代就已经写下了学术研究的皇皇巨著，也正在引领和倡导一股新兴的文学批评学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就是民主科学的精神，在哲学人文领域里插上科学的大旗，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举措。瑞恰慈曾写过《科学与诗》的专著，他的新批评理论也是借鉴了科学实验的方法和现代语言学的原理，他的这种研究方向和思想观点正好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诉求不谋而合，这无疑也是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主角之一的罗家伦以及清华其他教授力荐瑞恰慈的原因之一。瑞恰慈自己也谈道：“自从1927年我访问北京以来，我对中英关系感到极大兴趣，而且我非常高兴得到这么令人羡慕的机会，来为校际合作和国际间的了解做出自己的贡献。”^②这一决议的实行注定了瑞恰慈从一个曾经来过中国的观光客转变为直接参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难以解开的深厚情缘。

① 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② 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一、瑞恰慈在北平高校文化圈的文学活动

这是瑞恰慈第二次来到中国。瑞恰慈第一次到中国是1927年，他当时准备和相识多年的女友多萝西结婚，并远渡东方度蜜月。他们先是去了日本，然后就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生活了几个月，直到1927年的夏天才南下攀登喜马拉雅山。瑞恰慈第一次来中国的时间，大部分都是用于四处观光旅行。他很少和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人士有密切来往。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旅行，对瑞恰慈本人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和美妙的感受，但对中国的文学界和研究界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但是，瑞恰慈于1929年—1930年期间在中国的文学活动，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瑞恰慈夫妇于1929年9月14日到达了北京，紧接着就开始了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为期一年的紧张又充实的教学工作。1929年9月至1931年1月，瑞恰慈担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讲授“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① 瑞恰慈后来还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两门课程。他也曾经到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及文学批评”等课程，其中“文学批评”是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有关这门课程的介绍还有一段文字说明：“本学科讲授文学批评之原理及其发达之历史。自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至现今，凡文学批评上重要之典籍，均使学生诵读，而于教室讨论之。”^② 瑞恰慈丰富多彩的授课内容有时还会涉及语义学，例如1929年12月19日上午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讲“什么是意义”的问题，然后让学生们阅读和欣赏了哈代（Thomas Hardy）的一首诗。下午他又作了一场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讲座。讲座“没有做广告宣传，可听众很多，有140人”，瑞恰慈：“今天精神很足，演讲的主题是‘语言和逻辑’，听众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题目，可大家都表示愿意来听。”^③ 1930年6月1日出版的《北大学生》创刊号上就把瑞恰慈的名字列入委员会的顾问之中，他的名字直到1931年3月1日第4期才消失。瑞恰慈除了在北

① 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② 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③ 转引自容新芳：《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2页。

大和清华给学生们授课以外，还在1930年春担任了燕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主要讲授“‘意义的逻辑’与‘文艺批评’”。瑞恰慈作为历史悠久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名教授，能够屈就到刚刚开办不足30年的中国的新式高校任教指导，这种姿态使得当时北平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颇为感动。

瑞恰慈在中国教书期间写了大量的日记。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中国学生的看法。最初的阶段，瑞恰慈按捺不住自己来到一个东方古国的兴奋心情，对中国的景物和中国的学生有着极好的印象。他在1929年1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秋天我们在这里过得都很愉快。蓝天白云，秋高气爽，乡下的颜色和生活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巨变。人们忙于上课和迎来送往，所有这些就像梦一样在北平进行着。这里的学生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上课认真听讲，举止高雅，热爱学习，努力，耐心，记忆力强。”^①他在1929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也写道：“这里的学生都非常好，他们在记忆语言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上是欧洲学生的好几倍，他们不知疲倦地发掘、使用着自己的记忆力。”“我们都很喜欢他们，认为他们要学的英语语言是一种多么难学的语言呀！他们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呀！”“这些学生无论男女都绝顶聪明，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困难。”^②他在1929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还写到过这样的话：“这里的学生在学习上你追我赶——非常刻苦又十分浪漫。”^③

但是，随着瑞恰慈在任教的过程中对中国学生的逐步了解和认知，他对中国学生的总体印象开始发生变化。他认为这些中国学生的记忆力特别好，但是缺乏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他来到中国六七个月后，就曾经向他的一位同事抱怨过这些中国学生，他说：“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他们不像我们一样看重意义。没有人会问‘它的意思是这个吗？’他们只会说‘意思是……’，接下来的几分钟他们扯一些毫无关联的东西，这个过程似乎不对他们构成影响。他们喜欢欣赏诗所表达的总体情感、整齐的格律以及凝练的语言，而不是细微的微妙差别。他们十分关注技巧而非意义。与此同时，他们感情丰

① 转引自容新芳：《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8页。

② 转引自容新芳：《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8页。

③ 转引自容新芳：《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8页。

富,但表达相当模糊。”^①在这一点上,瑞恰慈与朱利安的看法何其相似。朱利安在武汉大学短短一年的教书生涯中也写了大量的日记。他也认为中国的学生普遍都比较勤奋,记忆力超群,但就是不愿意主动地向老师提问,也不愿意从学理的层面对一些晦涩难懂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索。瑞恰慈和朱利安的这种看法,应该说并不是带有欧洲文化中心意识的偏见,而是在中国的亲身教学实践以及对中国学生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所概括出来的。朱利安和瑞恰慈都是受到过剑桥大学学院派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文学研究的理解和分析都是建立在意义的探寻和真理的寻求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并不认为只要把握了文学研究对象的基本主题和情感就完成了文学研究的任务,他们认为必须运用科学的、逻辑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去剖析和分析研究对象,这样才能够从表面的意义之中去探寻到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当然,朱利安对中国学生中普遍流行的浪漫主义情绪、对事物的研究不求甚解的看法,还是停留在一个受到过西方严格的逻辑学和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学院知识分子水准上,还未能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论思想体系。瑞恰慈则是运用了他的那套新批评原理去要求和训练他的中国学生,他希望学生能够在分析文本的过程中养成去发现意义的习惯与本领。

毋庸置疑,瑞恰慈所开创的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通过交流与师承的方式,在直接的意义上影响了当时中国很多的学者和年轻的学生。瑞恰慈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朱自清、吴宓、叶公超等现代诗人也在清华大学文学院教书工作,这种交集使得瑞恰慈的学术观点必定会对他们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瑞恰慈和外籍来华诗人艾克敦不一样,艾克敦 30 年代在北平生活了八年,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经常会和北京大学的同事结伴出门郊游远行,在路途之中还会为了各种文学问题争论不休。艾克敦也经常参加 30 年代京派文人举行的各种文学沙龙聚会,是京派文化圈的一个洋文人。瑞恰慈在中国这一年的时间里,因为和妻子喜欢户外运动,经常去寻访北平附近的名胜古迹,他和清华大学这些同事之间虽有工作与生活上的交集,但交往并不频繁密切。不过,以瑞恰慈在西方学术界的名气和地位,即使他和这些同事没有太深厚的私人友情,但他来到清华大学教学的这种机缘也无疑会更加激发清华同事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批评观点的浓烈兴趣,并促使这些同事们在

^① 转引自容新芳:《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59 页。

学术研究时到瑞恰慈的学术思想中寻找资源与帮助。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就曾记载了自己与叶公超探讨瑞恰慈文艺批评理论的记录。他还在日记中写有自己如何认真阅读瑞恰慈著作的记载。朱自清在1934年给叶圣陶的书信中就写道：“弟现颇信瑞恰慈之说，冀从中国诗论中加以分析研究。又连带地对中国文法颇有兴味。暇当从事于此二端。”^① 新月诗人叶公超和瑞恰慈的私人缘分较其他清华同事要更为深厚，而且颇为有趣的是，叶公超和瑞恰慈都曾经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的麦戈德林学院，艾略特则是他们在英国时期所认识的共同的朋友。而被称为是“中国的雪莱”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又是他们私下里关系甚好的朋友。据说徐志摩在剑桥大学访学期间就认识了瑞恰慈，闲暇时期还为瑞恰慈朗读中国的诗歌。叶公超与徐志摩的友好关系则是通过胡适的引荐和《新月》的创办而得以逐步建立的。

瑞恰慈在当时北平私下里交往最为密切的是燕京大学国学院的李安宅。李安宅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一生都致力于民族学、社会学、藏学的研究。他主张运用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考察和研究藏区，可以说是一个学贯中西的社会学家。在瑞恰慈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他与李安宅交往的经历。例如，1930年6月25日瑞恰慈“与李安宅度过了美好的上午时光，并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期望”“吃过中午饭我们又搞了几页翻译”。11月17日到李安宅家做客，并对胡适先生的科学和哲学观进行了探讨，同时还探讨了“概念”一词。11月27日瑞恰慈得知李安宅将要派往波士顿，就专门安排时间与其聚会。^② 瑞恰慈和李安宅经常探讨中英翻译问题、中西哲学的差异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存在的问题。瑞恰慈和李安宅的频繁交往，使得李安宅对瑞恰慈的思想和理论有了较深的了解。正是在瑞恰慈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之下，本来是专注于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李安宅，也开始对文学研究领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李安宅不仅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论艺术批评》《我们对于语言的用途所应有的认识》《介绍几本美学书》等学术文章，而且还专门出版了一本旨在介绍瑞恰慈学术思想的文学理论著作《意义学》。

尤其要指出的是，瑞恰慈的学术思想不仅影响了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

① 朱自清：《朱自清致叶圣陶》，载《朱自清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② 上述史料均见于容新芳：《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3页。